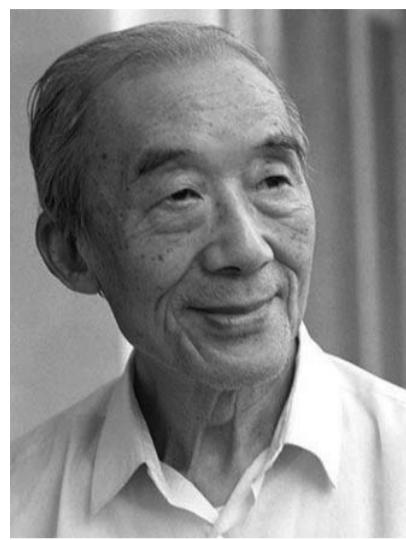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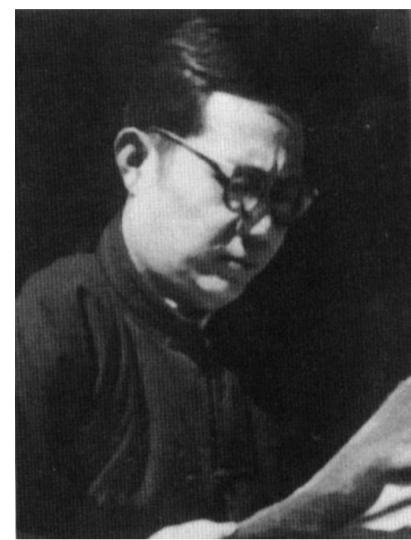


我心目中的《文艺报》“三驾马车”

□杨匡满



张光年



侯金镜



冯牧

我走出校门、走向社会的第一站就是《文艺报》，在这里，我有幸接触了很多品格高尚、学问深广的前辈，他们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，也是我事业上的引路人，与《文艺报》的这份感情是永远不可能割舍的。

在正式谈“三驾马车”之前，我想先提到一个人，这个人身上体现出文人的修养、宽厚、善良毫不逊于张光年、侯金镜和冯牧三人，他就是黄秋耘。黄秋耘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念书时是韦君宜的同学，曾经参加过“一二·九”运动，也是“中间人物论”的代表人物。《文艺报》正式为我下达调令的时候是1964年夏天，而黄秋耘早在1、2月份的时候已经提前到北大学生宿舍了解情况，可以说，把我“圈”到《文艺报》来的第一人就是黄秋耘。正是因为这样的机缘，我与黄秋耘有了一些联系，也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帮他给家人递送工资。尽管我后来离开了《文艺报》，他也回到广东从事出版工作，我们仍然保持着很密切的交往，他是我与《文艺报》结缘的开始。

理所当然的“老大哥”光未然

《文艺报》是我从大学走向人生的第一站，我也没想到这一站会如此漫长。1964年8月24日，我被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《文艺报》工作，当时我是有些惊讶的。因为我是个肺结核病患者，尽管传染病已经过去了，但身体还未完全康复。1971年在五七干校的时候，听谢永旺谈到往事，我才知道当时张光年问过了我的事情。原本希望把我先送到亚洲学生疗养院疗养，再投入到工作岗位中去。当时打电话到学校去的时候，正好是夏收期间，接电话的青年教师谢冕告诉对方，我随班长等同学一起下乡捡拾麦穗、参加劳动，对方一听我既然已经能参加劳动，想必身体是恢复得差不多了，因此我也就顺理成章地来到了《文艺报》。

从毕业来《文艺报》工作到进入五七干校

的这段时间里，《文艺报》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“三驾马车”，这“三驾马车”的大哥是张光年。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参加过国民革命，在缅甸、东南亚一带从事过地下抗日工作，既有着革命的情怀又有着诗人的气质，他的学识也非常渊博，不仅写过关于《文心雕龙》的专著，而且对于外国文学、马克思主义等专著也熟稔于心。我刚刚到《文艺报》的时候，他还在乡下搞“四清”运动，等他回来以后不久《文艺报》就停刊了，所以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深度接触主要是在五七干校的那段日子，我有幸与他同屋相处，前后差不多有一年左右的时间。当时，他的胳膊因从马背上摔下来而落下旧伤，但仍然拎着铁铲，十分吃力地与我们一起铲土、修田埂。由于睡眠困难，每天晚上中央专案组给他发两粒安定，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，无论白天劳动再辛苦，晚上他都会点一盏小马灯看书，也建议我可以读一读马克思的《1848年至1851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》《路易·波拿巴政变记》以及歌德的《浮士德》，莎士比亚的《雅典的泰门》等。当时干校没有《浮士德》，我回到北京以后从他家拿到了这本书，但非常惭愧的是，我一直没能啃完这本书，感到很对不起他。

尽管当年张光年是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对象，但我们两人还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很多年以后，单位同意他回北京探亲，我数次去他家中看望，他那已经80岁高龄的老母亲还亲自下厨为我炒了四个菜，郑重地感谢我在干校时期对光年的照顾，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十分感动。张光年对我的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作用是很大的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他是重要的引路人之一。

侯金镜：“理论家”兼“组织家”

当年包括我在内的10个大学生进入《文艺报》工作时，张光年任主编，侯金镜

绪，从何落笔呀？

经过仔细思忖，拟出概括性很强的、浓缩了《文艺报》几个重要历史关节点上的六个章节内容：缘起、创刊、昔日辉煌、停刊复刊、改革开放40年、继往开来，着眼于报人说报。

分段相对容易，怎样用诗歌的形式叙述那已逝的历史大事件，却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一切先回到源头：“六十年前，新中国建立/六十年前，《文艺报》创刊/从此，文学艺术界有了一份自己的报纸/从此，文艺报人有了耕种的家园。”

我似乎突然找到了一种叙述方式，《文艺报》不仅是一份报刊啊！她是与新中国同年诞生的，她的历史应该是回肠荡气的。接下来的“创刊”也使我找到了感觉：“在新东方已经冉冉升起的朝阳/在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的门槛上/走来了，走来了……/走来了年轻的执政党/在她身后紧跟着/是全国文学艺术界的栋梁！”写到这儿我仿佛置身于第一届文代会的会场，感受着《文艺报》创刊的历史时刻，血脉贲张，兴奋不已。“文革”前十七年的《文艺报》是最难书写的一段，如何描写这段历史，考验着创作者，我陷入迷惘。十七年中《文艺报》可以说与共和国休戚与共，风雨同舟，共同书

写着历史，想到此我写道：“共和国文艺的繁荣昌盛，跳跃在《文艺报》的眉梢眼角/共和国文艺的冷雨冰霜/也凝聚在《文艺报》的脸庞。”用这种拟人化的诗句写出那个时代的风雨彩虹，不失为一种适当的诗意表达。过来人自然明白其中的苦涩，未来人也可以：“翻开《文艺报》/你便会看到新中国文艺的筚路蓝缕/你还会思考我们曾经经历过的种种文化思潮。”

长诗《我们的文艺报》经三次修改付诸排练，报社全体人员包括临时工悉数上阵，演出获得极大成功。整场演出中，《文艺报》是惟一一个以全体人员出演的单位，我想通过这次演出对于凝聚报社人心，展示整体精神面貌，以及让年轻编辑人员了解报社的历史，增强责任心和自豪感，都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。

我说：“我们也来一个。”小冯说：“人家是专门搞文学的，选个好作品大家朗诵，既有品位，又属本行，咱们朗诵个什么呀？”我说：“就说说咱自己！说说咱文艺报。”小冯说：“哪有现成的东西？”我说：“现写一个！”小冯高兴了：“福哥，你义不容辞！”

得！自己挖坑自己跳，被小冯逮个正着。也算是临危受命。我应下了这个活儿。然而，我提笔写下诗歌题目《我们的文艺报》之后，便久久地呆在了那里。《文艺报》60年的历史，千头万

个团支部的青年编辑阎纲不过30出头，他撰写的中、长篇小说评论文章已然名声在外，我想，这一方面是青年英才的个人能力使然，另一方面也归功于报社领导对年轻人的信任和提携。

冯牧：“救火队长”兼“一号伯乐”

我初到《文艺报》时分配在作品评论组，参与的栏目叫“新人新作短评”，当时这一组由副主编冯牧负责。冯牧是这“三驾马车”中的“笔杆子”，有时候报社遇到比较急迫的重要选题又找不到合适的作者时，需要内部人员来完成工作任务，冯牧常常就像团队中的“突击手”和“救火队长”一般，承担起撰写文章的重任。尽管他是我的领导，但正如冯牧自己说过的那样，他是“最没有架子的”，平时我也经常去他的家中闲聊、谈心。

在五七干校的时候，冯牧是住在我和张光年隔壁的邻居，也是经常与我促膝长谈的朋友，我们聊得很交心，甚至还聊到他的恋爱经历、婚姻体验和爱情观念。有一次，我在与其他人聊天的过程中，很随意地提起美国的报纸可以批评总统，结果一个在场的干部批评我犯了思想原则上的问题，要向上级报告。冯牧出面说服了他，也保护了还是青年的我。

在“文革”后期，冯牧因身体原因获准提前回到北京，当时我拜托他帮我买一些书寄回来，比如《天演论》《巴黎公社史》以及摩尔根学派的专著之类。我在散文集《感恩的翅膀》中，曾有两篇文章怀念在《文艺报》时期与冯牧的交往，以及在五七干校与他一同看守草料场的日子。在这段时间内，我们曾有过很多通信，郭小川、张光年等人与我的通信都是拿信纸一板一眼、工工整整地写，而冯牧则是拿香烟纸非常随意地给我写信，我在信中称他为“冯先哲同志”。后来我回到北京以后，也经常去他家蹭饭、闲谈，有时候“没大没小”地互相寻开心，成为平淡生活中一点难得的乐趣。

冯牧的家里总是高朋满座，不仅有部队里的故交，也有地方上的作家，甚至还有京剧演员。客人离开以后，冯牧总是一个人静静地读书，直到深夜。冯牧可以说是作协领导中阅读作品最多、扶持作家最多的人，因此旁人都说冯牧是“秀才不出门，全知天下事”。张守仁曾撰文将冯牧称为“文坛一号伯乐”，我认为这种评价并不夸张，因为他以独到而敏锐的眼光在文学界发现、培养、扶植的文艺新人数量最多，其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了当代文学写作团队的中坚力量。

为什么称张光年、侯金镜、冯牧为“三驾马车”？因为我发现他们身上体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人格和道德魅力，他们三个从来没有互相揭发或在背后说坏话的时候，在那样特殊的时代环境下实属难得。《文艺报》的这三个人，一个老大哥张光年在前面驾辕，后面跟着侯金镜和冯牧这两匹骏马，这就是我心目中的“三驾马车”。

我希望文艺报社后来的年轻人们能够记住他们、怀念他们，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在一个新的时代和新的环境下把报纸办得更好，对得起广大的读者，对得起历史。

我与《文艺报》

□颜慧

我和《文艺报》的缘分从大学刚毕业就开始了。

彼时二十刚过人生彷徨，不知何去何从，恰好有《文艺报》的实习机会。我本科学中文，自然知道这份报纸在文化界的分量，遂决定边实习边复习考研。

去了没几天，时任总编室主任的张陵老师就布置了个任务：你采访一下邹友开，写篇“侧记”。又递个电话号码说，可以请秦导帮着联系。谁是邹友开？啥是侧记？采访什么？秦导是谁？为给领导留个好印象，咱也不敢多问，更不敢多说，硬着头皮假装熟练工一口答应，一面忙不迭翻阅学习往期报纸，一面心里小鼓直敲。照着号码拨过去，电话那头是央视名导秦新民，他的开朗健谈鼓励了我。秦导可能听出我的怯生生，不仅耐心讲解来龙去脉，还抽时间陪我一起顺利完成首次采访任务。后来了解到，秦老师连续十多次参加央视春晚总策划、总撰稿，是业界大咖。

还有一次要采访哲学大家张岱年，当时犯了愁：上哪找张岱年先生？辗转通过同学找到北师大哲学系主任周桂桂教授。周老师并不认识我，但一听是《文艺报》记者，欣然帮忙约到张岱年，并在北京寒冷的冬月，特意骑自行车从北太平庄到中关村张老师的住处，陪我一起采访并热心给我们拍照。我的记者生涯还遇到很多这样的师长，他们的无私帮助让我心存感激。记得那次跟张岱年先生讲了采访内容，他问版面大概多少字，我说2000字。先生沉吟片刻便侃侃而谈，正听得入神，他却戛然而止说：够了。回去整理录音，发现几乎不用怎么调整，顺着记下来就是篇非常好的稿子，一数字数：1998字。

就这样，从零开始，组稿、编版、采访，我逐渐进入角色，越来越驾轻就熟。当年顺利考上研究生，直至毕业正式成为《文艺报》一员。一晃就是十余年。

在《文艺报》时常跑活动、跑采访，出差不断。印象最深的是2007年参加中国作协与总政宣传部联合组织的“中国作家走军营”采风，很多文坛名家参加，是少有的一次对海陆空军的全面了解。那十几天几乎每天写一个头条或报眼，又兼现场摄影，当时网络远不如现在发达，每天写稿、找地方找网络发稿，常常折腾到下半夜，第二天还得依部队作息早上6点多就起床。苦则苦矣，但看到自己的文章印在精心编排的头版，觉得值得。

多年过去，曾采访过的如张岱年、华君武、张开济、罗哲文、冯其庸、袁运甫、陈忠实、朱乃正等一些老先生相继驾鹤西去，但他们的为人、为文，至今激励着我继续前行。

十余年来，我见证了《文艺报》从最初的每周一期到每周三期，再到后来每期8个乃至12个版；我也经历了从总编室、《作家论坛》周刊，到新闻部……就这样，因了《文艺报》，陆续接触到文学艺术诸多领域的顶尖学者。文学领域自不用说，尤其在新闻部时因头版选题需要，对当时大多知名作家或有过报道、或有过专访；后来报社又相继创立几个专刊，版图进一步扩大。我时任新闻部主任兼负责《世纪美术》专刊，那段时间有靳尚谊、邵大箴、冯远、闻立鹏、韩美林、陈履生等美术界大家鼎力支持，有可爱的同事们共同努力，《世纪美术》专刊逐渐在美术界有了一席之地，我的视野也不断拓宽。

后来工作调整，虽不在《文艺报》了，但还在一个办公楼。有时上班还不自知地按下6层电梯，地址也仍会写成“农展馆南里10号6层”。或许潜意识里，我依然把自己当成《文艺报》的一员，从未离开。

世纪之交，中国改革如火如荼，各行业都在忙着迎接“千禧年”的到来，但中国文学发展相对滞后，《文艺报》的日子更是难过。金坚范同志接任总编辑以后，社委会决定打破原有的建制和格局，把原来的周三刊变成三个周刊编辑部，各自开展编辑业务，以尝试探索推动《文艺报》的改革。

那时，我当总编室主任，在社里公布决定时，我还在外出差。总编室副主任陈新民打电话告诉我，社委会要求总编室也承担起编辑一个周刊的任务。我、陈新民、颜慧从总编室出来，加上副刊部出来的胡殷红，理论部出来的熊元义，后来又加入了新毕业的纳杨，组成了新的周刊编辑部。

刊名大家起了很久，还是受到陈新民的启发。他主张起名字要像美术里的人物一样挺立起来，于是就有了“作家论坛”这个名字，颇为响亮，也有形象感。更为重要的是，顺着他这个思路，大家在讨论中形成了新的编辑思想。我们决定，“作家论坛”将以作家艺术家讨论社会性话题、干预现实性问题为主要内容，以突出文化人物专访为特色，看看能不能闯出一条路子来。这些内容和特色，都是当时编辑业务的弱项与短板。

大家有一个共识，那就是坚守《文艺报》这个阵地，别让《文艺报》的魂散了。“作家论坛”时期，大家群策群力，搞了好多策划案，出了许多好选题，团结了许多作家、美术家、评论家、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，开始有了一些影响。我们还经常要策划一些研讨会，争取得到一些资助。日子虽然过得紧巴巴的，但大家工作热情很高，很有精气神，有不少选题策划做得很出色。最值得一提的，还是围绕实现专访吴冠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策划。

2000年前后，吴冠中先生发表了不少美术方面的见解，引起了评论界和读者的关注。1月6日，美术评论家陈履生用江洲的笔名在《艺术周刊》发表题为《断线的风筝——我看吴冠中先生用彩墨画在宣纸上的画》一文。紧接着，陈履生又在《艺术周刊》发表《与吴冠中先生商榷》一文。这本是正常的文艺评论，但此后却被媒体和部分读者严重误解。这件事一开始并没有引起“作家论坛”的注意，等我们着手准备对吴冠中先生进行人物专访时，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陈履生来编辑部看陈新民，正好我也在。陈履生对社会文化很有研究，我们趁机让他给我们写专栏，一周后开始发他的文章，以后他每周都及时到稿，一直坚持了好多年。那时，“作家论坛”有两个专栏文章引起读者的注意，一个是我的文学时评，一个就是陈履生的专栏。我的时评随着“作家论坛”结束就结束了，他的专栏还一直在开。据我所知，在中国，几乎还没有哪一个作家能为一份报纸连续写20年专栏。这也算是创造了中国媒体史上的一个经典数据。

每次签发陈履生的文章，我想的都是我们的记者怎样才能专访到吴冠中先生。后来我们了解到，社会对吴先生的任何反映，都会挑动“工美”方面敏感的神经。实际上，“工美”方面对陈履生文章的不认同正在转化成对陈履生个人的不满。于是，我们认为，眼下最重要的事情还不是采访吴先生，而是要让“工美”的同志认识陈履生，认识到他是一个优秀的评论家，而不是麻烦制造者，要把“工美”方面的看法扭到学术争论的思维框架上来，消除一些人意气。最好也是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读到陈履生的文章，了解陈履生的思想和水平。不久以后，陈新民通过美术界的朋友带来了“工美”对陈履生的评价。他们认为，尽管不支持陈履生对吴先生的观点，但承认陈履生的文章有思想有高度，现实针对性强，能抓住美术界的大问题进行评论，是好文章。我听了非常高兴，心里感谢这些有良知有学识的“工美”专家。他们认可了陈履生，情况就会朝好的方向转。

正好有个机会被我们抓住。工艺美院正在准备给自己的老院长常沙娜先生，让当时还是年轻记者的颜慧顶上去。她曾在美术界工作过，人头很熟，也重视这个专访，做了大量的案头准备，我们又反复修改了采访提纲，重点让她讲讲父亲常书鸿当年保护抢救敦煌的故事。文章上版时，陈新民精心选了常沙娜少年时代的一张非常美丽的照片放大，我起了题目《做敦煌的女儿》。这篇专访出来后相当轰动，常沙娜接到无数电话，其他媒体不断转载，美术界都赞扬，“工美”也感谢《文艺报》。颜慧一举成名，她很快又专访到另一位“敦煌的女儿”，敦煌博物馆的院长樊锦诗。这位一生都在敦煌工作的大学者，对中国传统文化严重被破坏表示了深刻的忧虑。那个时候，很少有人能意识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，破坏文化就是丧失民族灵魂。我们把她的思想通过专访报道出来，也算有一点文化责任心。

和“工美”关系理顺后，工作开展就顺利多了。他们非常支持《文艺报》专访吴先生，不断和吴先生沟通、做工作，为我们的专访排除障碍，创造条件。专访的时机正在到来。这个时候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翟墨先生来编辑部做客。他是吴冠中研究专家，写过吴先生的传记，是吴先生信任的学者。他对吴先生研究很深，自然对最近关于吴先生艺术观点的一些讨论很关心，想给《文艺报》写点东西，谈谈看法。我们建议他不介入这场笔墨混战，而是正面评论吴先生的美术思想观点，帮助读者更全面更深刻认识到一个艺术大师的创新意识和文化价值。很快，这篇文章以《吴冠中四题》为题目发表出来了。翟墨也来电说《文艺报》的文章吴先生看了很高兴，同意接受采访。这是“作家论坛”成立以来最大的喜讯，所有的人都非常兴奋。

事实表明，采访中吴先生显示了一个大艺术家的风范和思想境界，没有过多纠缠于眼下的争议，而是重点谈时代、现实、人生、艺术、美学和创作。看似漫谈，却也能突出主题。从字里行间可以读出，他对《文艺报》和陈履生先生的误解已经消除了。文章上版后，我起了一个朴实的题目：《我就这么想，这么说，这么做》。这篇专访恰逢其时，引导着学术讨论的正确方向，产生了非常好的社会影响，为这场讨论画上了句号。对“作家论坛”来说，这是对团队合作精神和选题策划的一次重要检验。这次专访以后，“作家论坛”编辑的思路空间就完全打开了，也打开了新的工作局面。

□张陵

回忆《我们的文艺报》

□杜家福

写着历史，想到此我写道：“共和国文艺的繁荣昌盛，跳跃在《文艺报》的眉梢眼角/共和国文艺的冷雨冰霜/也凝聚在《文艺报》的脸庞。”用这种拟人化的诗句写出那个时代的风雨彩虹，不失为一种适当的诗意表达。过来人自然明白其中的苦涩，未来人也可以：“翻开《文艺报》/你便会看到新中国文艺的筚路蓝缕/你还会思考我们曾经经历过的种种文化思潮。”

长诗《我们的文艺报》经三次修改付诸排练，报社全体人员包括临时工悉数上阵，演出获得极大成功。整场演出中，《文艺报》是惟一一个以全体人员出演的单位，我想通过这次演出对于凝聚报社人心，展示整体精神面貌，以及让年轻编辑人员了解报社的历史，增强责任心和自豪感，都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。

得！自己挖坑自己跳，被小冯逮个正着。也算是临危受命。我应下了这个活儿。然而，我提笔写下诗歌题目《我们的文艺报》之后，便久久地呆在了那里。《文艺报》60年的历史，千头万